

晚年巴金，生命因文学更绚烂

——读陈喜儒散文《在巴金身边的日子》

□陈德宏

在巴老离开我们近10年的今天，陈喜儒的散文《在巴金身边的日子》(载《人民文学》2013年第10期)，让这个讲真话、抒真情、对友对事对文学对读者都无限真诚的巴金，带着他的思想与情感的温度，重新回到了我们这些崇敬爱戴他的广大读者中间。

《在巴金身边的日子》给我们诸多启示与教益。

真正优秀的文学是没有国界的。

优秀的文学是人类的共有财富。每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，都以自身独立的民族特色充实着世界文学宝库，所以它同时也是世界的。1980年年初，时年76岁的巴老率团访问日本，受到日本朝野一致的欢迎，引起社会轰动，让我们领略到、感受到了巴老的文学及其人格在日本的巨大魅力。

代表团到达东京的第二天上午即前往首相官邸拜访，受到大平正芳首相的热烈欢迎。为了欢迎巴老一行，日本各界人士成立了“欢迎中国作家代表团委员会”，制定了周密细致的访问日程。仅在东京4天内就举行了两次欢迎酒会，日本各界名流尽出，济济一堂，盛况空前。而巴老的三次即席演讲(两次是在东京的欢迎酒会上，一次是在长崎的告别午餐宴)都很简短，没有铺排渲染，没有华丽的词藻，但却感人至深——

……
我这次来，是为了还债的。在友情上，我欠朋友的债太多了。在受“四人帮”迫害时，许多日本朋友打探我的消息，为我的安全健康担心。在“牛棚”中，我常常想起他们，心里感到温暖……

……在中国作家由于种种原因保持沉默时，井上靖先生、水上勉先生、开高健先生却先后站出来，用淡淡的几笔勾勒出一个个正直善良的作家形象。日本朋友这样关心我们，实在令人激动。

我真想把我的心分成两半，一半留给朋友，一半带回中国……

在长崎的告别演讲中，巴老用他此次访问中捕捉到的两个细节，展现中日作家之间友谊的深厚与真诚。其一是巴老接受电视台采访，在新大谷饭店院子里与小说家水上勉对话。“后来起风了，清水正夫先生几次到院子里看风向，怕我着凉，感冒……他希望风改变方向，风不要吹到我身上。”其二是巴老有一次做《文学生活五十年》主旨演讲，“演讲会举行的前一天晚上，事物局建议请作家丰田正子在会上念译文。她为了念好我的讲稿，一夜没睡，把7000字的讲稿重抄了一遍，这些都深深打动了我的心……”

然而，更令人感动的是日本广大读者对巴老的热爱与拥戴。从埼玉县赶来的若生爱子，1945年至1958年在中国从事卫生及教育工作时读过巴老的《家》，返回日本后她在家乡组织了巴金作品读书会。听完演讲，她冲破工作人员的“封锁线”，把当场书写的致敬信交到巴老手上……代表团乘新干线由广岛前往东京时，途经一个小站，站台上出现了一条横幅标语，用斗大的字写着“欢迎中国作家巴金先生”，几个西服笔挺的人冒雨挥手向车内致意，长崎县立图书馆馆长中川和夫拿来两本书请巴老签名，巴老不仅给这两本书签了名，而且在扉页上写下了“来到长崎，我实现了40年前的心愿”。中川和夫大喜过望，当场宣布：这两本书从此不再外借，将作为长崎图书馆的镇馆之宝，永远珍藏……

在岁月中打开迷幻的时间

□张德明

在诗集《恍然隔世》自序中，诗人夏海涛写道：“诗歌从来都是一把钥匙，是通往大地和心灵深处的奇特密码。”这句话凸显了他的某种独特诗学观。我认为，夏海涛的过人之处是，他手握诗歌这把神奇的钥匙，在岁月之中轻巧地打开了迷幻的时间之门，其诗可看作是关于时光的精彩言说和艺术诠释，从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季节轮转的自然踪影，也能把捉到启人心智的时间哲学。

时间是标化人类现身和存在的重要物理符号，不过，当我们陈述时间时，常常要借助与之相关的一些事物，诸如季节、节令、日程等来将其具体化。夏海涛无疑是对时间极度敏感的诗人，在他的诗中，各种与时间相关的艺术符码俯拾即是，诗人有关生命历程、岁月流转和个人记忆的人生印迹也一一闪现。夏海涛诗中的季节语符最为丰盛，春夏秋冬四季都在他的诗中不断出场，既显示出各个时段自然物象的不同特色，又显示出诗人面对游走的光阴时内心的各种折痕。《立春》写道：“我把秘密埋在冬天/把种子埋下/让摇曳的小手在空中张开/柳叶在希望里歌唱//……那些走过的曲折/一并刻画着春秋/爱过的人依然爱着/将要来的人/在心里慢慢盛开//雪是在昨天融化的吗/上弦月的弯曲里/银光幽幽/春天从上面悄然跳下”。当春天来临，诗人为“希望”鼓舞，被“爱”感动，他从上弦月的“银光幽幽”，看到春天“悄然跳下”的时光飞逝，这样的描述既是朴实自然的，又是富于想象的。同样是节气，“冬至”在诗人笔下呈现了另外的情态：“北方的冰凌/沿着九九寒冷的轨迹/转动日晷/不可思议的季节/由于你/雪花也变得温暖而轻盈//太阳像一个跳绳的小女孩/从北回归线跳到南回归线/你黑色的长发/风一样飘逸”。这首诗将太阳比喻成一个“跳绳的小女孩”，在南回归线和北回归线之间跳来跳去，以此描述时光的飞逝和季节的轮换，显得极为生动形象，也流露出青春气息和生命情趣，“冬至”的特别韵味，也巧妙彰显。

季节和时令确乎是典型的时间符号，但它们并不代表所有时间，有时候，人类对时间的感受，可能会超越具体的季节指向，而只聚焦于某个时间点的文化内涵。某个存在瞬间的生命感。在《我们的节日》里，诗人以诸多蓄满力量的词汇，来集中渲染“节日”的喧嚣景观：“旌旗在摇/红色的激情直上九霄/泼洒的汗水把快乐举起/我们/把自己举起/……这是张扬的节日/这是进发的日子/大河倒卷着/一路奔涌/雪山挺立/莲花绽开雪白的传奇/大平原 随着河流/消失在辽阔的茂密”，“摇动的旌旗”，“滴落的汗水”，“奔涌的大河”等等，无不诉说着“节日”的喧嚣与欢闹。《恍然隔世》则是对“回眸一瞥”的美学阐释，诗曰：“那么深的水也没有隔开/沙漠与绿洲 你只是回眸一瞥/鸟儿们仿佛听到了指令/汇聚在七夕桥头/打破了一个世纪的沉默//……鸟儿开始顺着季节/提前迁徙/从遥远的北方 奔赴遥远的/南方/顺着阳光的道路/挥动有力的翅膀//这样的一切如自然/仿佛千万年来 只为了等待/你的回眸/南方投来的那束阳光”。深情的“回眸”，恰似一束“阳光”，那种暖人心怀的魔力，被诗人精彩地显示出来。

在光阴流转之中，人类生存的秘密、宇宙暗藏的法则，都会悄然现身，但一般人往往会熟视无睹，只有诗人才留意这些，并用心记下。夏海涛的诗中，也时而有时间的哲学思辨词句跃然而出，令人深受启迪。《蓝色天际》最后一节如此写道：“不在飞行中永恒/就在静止中坠落/所有的心都已经打开/做着无翼飞翔的姿势”。“飞行”与“静止”的并举，述说的时间与运动的关系，而“永恒”和“坠落”的结果性论断，或许并不只是对鸟儿飞翔的某种哲学领悟，而是对人类存在规律的某种深度阐释。另一首题为《春天》的诗，以季节为思维起点，体悟人与事，并从花的情态中折射人生的玄机，也不乏深意。

作家为读者服务，不是口号，不是空话，而是溶入血液、化为自觉的行动。

访日期间，巴老每天都要会见各地官员、作家、记者，要应酬、讲话、准备讲稿。繁忙的日程，年轻人都有点吃不消，更何况巴老。一天的活动结束，回到宾馆，还有任务：为慕名前来的读者签名。不管是地方法政长官、社会名流，还是一般读者，巴老都有求必应，而且又特别认真，不是简单的签名，总要根据不同的人，写一两句有意义的話，每晚少则写几张、多则十几张“色纸”(专供签名题词的纸版)，为此不知花费了多少时间。作者心痛巴老，劝他少写几张，多休息会儿，巴老却说：“我们作家是靠读者养活的，要为读者服务。”

“为读者服务”、“为人民服务”……我们听得太多了，但从巴老的口中说出，别如天壤，含金量是多么不同啊。言行一致，表里如一，普通而伟大，平凡而崇高，这就是巴老感人至深的文品与人品。尤为难能可贵的是，巴老这种把心交给读者的真诚贯彻于他文学生涯的始终。

赵瑜的《寻找巴金的黛莉》，通过青年作家巴金写给比他更年轻的读者黛莉的7封信，抽丝剥茧，追踪访录，展现了从民国到抗日时期的社会风貌、时代精神。而弥漫全篇的则是巴金对黛莉的循循善诱、平等相待，及其忧国家、忧民族、忧苍生的人文关怀。

《在巴金身边的日子》也写到了一个巴老与之长期通信却从未谋面的读者汤逊安先生。“汤先生生前，极敬重巴金，有一次去见楚图南老，不知怎么提到了巴金，结果把要讲的事给忘了，从头至尾谈的是巴金的书。”作品关于此事的叙写极为简略，只知道汤先生一直从事新闻工作，是世界语学者，也没见过巴老。正因如此，作品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：从巴老(托人)在电话中要作客代他到“阜外大街北四巷”汤先生府上敬献花圈，可以肯定他们有着长期的友谊；他们之间的通信是何时开始的？黛莉受巴金作品及通信的影响，反叛封建礼教，追求自由、民主的新生活，面对滔滔黄河，眺望延安，最终却没有跨越黄河，奔向延安，成为她人生憾事……而一个年轻的世界语学者汤逊安却于1938年投身革命，这于巴金有何关系？……循此思路追踪开掘，没准可以写出《寻找巴金的黛莉》的姊妹篇《寻找巴金的逊安》……

佐藤女士把多半生的时间、精力、智慧都奉献给了日中友好事业，她既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工作人员，也是巴老的忠实读者。巴老1961年访日时，就认识了这个梳着辫子、刚刚大学毕业的姑娘，如今她已是满头白发，垂垂老矣，但依然为中日文化交流而奔波。有感于此，陈喜儒写了一篇七八千字的散文《佐藤大姐》，刊于2003年11期《人民文学》。载有《佐藤大姐》的刊物辗转送到巴老的病房时已是2004年初了，巴老居然神奇地睁着眼睛听完了这篇七八千字散文的朗读……

我之所以强调时间节点，是因为这一年刚好是巴老百岁生日，此时的巴老正躺在医院里，有时靠呼吸机维持生命，但尚有意，每日听身边工作人员读书、读报、睁着眼睛，表示他感兴趣，愿意听；闭上眼睛，表示他累了，该休息了……

这是否就是巴老与他心爱的读者最后的倾心交流呢？

对日友好，以史为鉴；交友交往，以诚相待。
巴老曾6次访日，无数次地接待过日本文艺界同行的来访，结识了数不清的日本作家、艺术家。无论是中日两国建交前还是建交后，巴老都以巨大的精力与巨大的热情

春溪湾，很赋予诗意的村庄，“那款款的风，飘飘的雪，纷纷的雨，淡淡的花香，盈盈的露珠，幽幽的萤火，熠熠的星光，轻轻的晨雾，袅袅的炊烟，唧唧的鸡鸣，嘤嘤的蜂鸣，弯弯的山路，青青的竹林……”这就是喻晓新近出版的散文集《翻阅美丽与忧伤》中所描绘的故乡春溪湾的情景。刚一翻开就让我怦然心动，勾起我沉淀已久的浓浓乡情。

就在前些日子，我刚从故乡回来，耳濡目染了不少家乡的风色，正好与我的情愫相融、相扣。逐一翻阅起来，使我倍感亲切。喻晓是我几十年的老友、战友，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《工程兵报》任职时，我的诗歌经他润色发表；他调到《解放军报》后依然看中我，交友不断；也许我们都生长在农村又同在军旅，爱好、习性、志向相同，之间有许多情缘、默契的暗合。我想，

到目前为止，李林芳的诗歌世界其中心都是在—个叫做“艾润”的地方。这个艾润并非—个现实的所在，而主要是一个精神性空间。“艾润”是李林芳构筑的一个精神家园、心灵归宿，包含了其内心世界的诸多奥秘，同时也构成了一个颇为独特、具有魅力的审美空间。

在李林芳在回忆性文章《一个局外人和她的诗歌写作》中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实当中的艾蒿润是她诗歌的起点，也是个人精神的秘密，而文字当中的艾润则是现实中艾蒿润的转化、提升，是理想的化身、精神的归宿。李林芳的“艾润”从其发生来讲是由于诗歌，其内涵也是诗的、诗意的。艾润从现实中来，承载的却是对理想、对“完美生活”的想象。

《有个村子叫艾润》中所写的艾润在李林芳的诗歌版图中是较有代表性的，体现了一种宁静、自然、安闲、融洽的特质。其中写道：“在群山的褶和皱里 汗水一样流淌的/是一条小溪和另一条小溪 他们宿命的相遇/像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像一棵树上谁—的两个枝子/这里—是一条河的源头 叫艾润的村子/是缓在大树枝杈间—嘟噜—嘟噜的玉米”。在这里人与自然、人与入、自我的内心都是和谐、完满的：“季节的截面上—一个男人走近—一个女人/一个女人走近—一个男人/成为—一棵树上的两个枝子/让我们把爱情的核种在这天河—里/小河一样从艾润长长长长/树干一样从艾润汲取生命的养分”。故而，诗的最后一句写道：“艾润是浮躁繁重的内心—里腾出的/最清静圣洁的空间/盛满—世世的相望”。艾润是一个更为接近传统、接近自然，而与—现代、与城市较远的地方，它本身是一个

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，用汗水与心血浇灌、呵护中日友谊之花，拿巴老的话说就是“让子孙万代友好下去”。为此，巴老每次访日，都不顾劳累，广交朋友，广结善缘，他与井上靖、水上勉、西园寺公一等作家的友谊，真挚而感人；他步履蹒跚，拖着年高体弱的病体，看望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全体工作人员，为中岛健藏扫墓，令人感动得直想落泪……

巴老的对日友好交往，有一个前提或者说基本信念：以史为鉴。1982年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掀起了一股逆流，为军国主义招魂，修改历史教科书，将侵略说成“进入”。巴老为纪念中日建交10周年而写的文章《答井上靖先生》，于中日两国主流媒体同时刊出，对此谬论予以抨击。他说：“把侵略改为进入，可能还有人想再次‘进入’中国。这些年我同日本友人欢聚，常常觉到，保卫子孙后代的幸福，我们责任重大。”巴老还说：“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，也是无穷的，问题在于让他们看到真相。作为文学家，我们有责任把真相告诉他们，免得他们再受骗上当。”

巴老的文章，立刻在日本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与共鸣，许多有正义感的作家、艺术家纷纷撰文支持、响应。高桥樗一郎说：“日中友好，必须建立在对历史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，否则，不会有真正的好友。”

巴老与老一代文人的交往，展现了大师风范。他们之间没有文人相轻，只有文友相敬，惺惺相惜。作家代表团内部的相互称呼，很有趣：“……比如我们称巴金为巴老，冰心称巴金为老巴，而巴老称冰心为大姐，小林称冰心为姑姑，吴青称巴金为舅舅……”寥寥数笔，就写出冰心与巴金亲如手足的姐弟情谊。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爱，更是令人动容——巴老的三位老朋友中，曹禹生病住院，夏公、冰心都年事已高，他自己又体衰多病，不能亲往探视，只好托人送上鲜花与祝福，照几张照片带回上海给他看，以解惦念。而曹禹的一段话更是堪称文友相交的佳话。他说：“每次见到巴老，都有许多话要说。巴老也有许多话对我说。于是他说，我也说，谈得热火朝天。但我听不太懂他的四川话，他也听不太懂我的话，但就是想谈，滔滔不绝，没完没了，实际上，谁也不懂对方的话……”

真正的朋友交往，已超越了语言的层次。这是意会，是真正的心与心的沟通。

《在巴金身边的日子》文笔质朴，饱含感情，抒写了巴老最后25年的生命历程。从生理上讲，此时已是巴老生命的衰晚期，而在精神上恰恰进入了他主体意识的活跃期、彰显期，博大而完美。《在巴金身边的日子》呈现给我们的正是巴老晚年的生命常态。愚以为，这样的文章，传记作家、评论家写不出来，他们缺乏亲历的在场感，或者过度的理论烛照及过度的意义挖掘，过滤或者说屏蔽掉了巴老本真的样貌及感人的细节。愚还以为，巴老的亲属也写不出来，因为亲人眼里无伟人，居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……

亲历、在场、距离，再加上作者对巴老文品及人品的崇敬，成就了这篇大散文。

巴老在日本的讲演《我和文学》中的一段文字，令日本听众为之清然泪下，他说：

我快要走到生命尽头了。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，我要写，我绝不停止我的笔，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，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，我的爱、我的恨也不会再在人间消失。

晚年巴金，生命因文学更绚烂。

寻根春溪湾

□峭岩

其中的原由就是我们的“根”扎在乡村，所以，对乡村乡情有不着约而同的笔触。几年前我曾出版过自传体散文《我的老屋我的村》，是地道的乡情画卷；今见他的这本书如出一辙，也是一次童心的回望，让我喜不自禁。

本书可说是喻晓为故乡的塑像，也是他个人的传记。他把笔投向故乡，以“我”为情感主线，串起春溪湾的春秋岁月，他的悲欢离合，故乡的翻覆更替、家乡人的质朴美德……别致有序地展开，一幅幅风情画跃然纸上。他的笔触细腻，情景独特，

纸上艾润 心底家园

□王士强

美好、自足、自洽的所在。《雨停了》中写道：“首先是蓑衣 滴着日子里的雨水/被山路和岁月磨烂的草鞋/歇在黄泥土墙上 一些茅屑几颗无头无尾咯疼脚掌的石子/还是行走的姿势//然后是西窗 木格窗棂折叠着/古人的山水 年代太久远了/远到魏晋和先秦 还有古筝/悠远清凉 一会儿屋檐滴水/一会儿几和雾霭一起侵入深深的幽谷”，这其中“自然”是主体，人即使存在，也是“隐者”，是存在自然之中，而不是与自然竞相争、对抗的。这样的书写在李林芳的诗中有很多。诗中所表达的大致是一种天人合一、物我一体、物我两忘的状态，这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是比较普遍的，而现在李林芳是在现代社会，用现代汉语表达了与之相近的追求。如果分析起来，这其中应该是别具深意，包含了对现代性、现代文明的反思与审视。而且，与沈从文供奉着人性的“希腊小庙”的书写类似，李林芳的“艾润”中所体现的也是一些恒常、美好、纯粹的价值，它不在场，久已失落，或从未到来，但却值得人们永恒的追求、瞩望。

李林芳诗中的情感世界是稳定、和谐的，这其中人伦的良善、温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许多的诗写得非常感人。《山菊花》回忆母亲，并以“山菊花”相喻：“母亲弯下腰去/深深地 比一穗熟透的谷子还低/贴近秋天的根部 锋利的镰刀/把谷

我是喜欢普玄的小说。其小说读起来有刺激，使你为之一震。后来知道他的为人，又觉得奇怪：一个崇尚中国本土的道文化的人，怎能写出这样有现代味道的小说?这其中的原因何在?

所以我说，普玄小说是现代性的，又是传统的，是在往深入处走的小说。

那么，什么是现代性?现代性里包含了工业发展、科技发展、市场经济、以人为本以及自由、法制，又使人的生活和精神支离破碎，从而出现反叛、疏离、绝望、孤独、苦闷、荒谬、变态。

20世纪至今，中国在学习西方，尤其是20世纪末以来这十多年，现代性是中国的社会主流，也是文学的主流。在这样一个从社会到文学全面学习西方的大背景下，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有各种观念和种写作途径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，就是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，如何在认识中使我们深入，在学习了西方之后，如何建立我们的现代性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社会出现了现代性，我们的文学相对应的又有了哪些境界上的变化、审美上的变化?我们的文学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有什么是相同的，什么是不同的?在思考中逐渐完成我们的现代文学体系。这应是一种对应后的自觉。

普玄的出色是在这种背景下做出自己的反应。他有独特的生活经历。他对传统文化又有所了解，因为传统小说的选材、形式、语言不能充分表达自己，不能完成自己的叙述，他才选择了如今的写法。他的这种写法在下当看是新颖的，有其革命性，在描写社会情境上、审美取向上、形式语言上常常就写出一一种反叛、绝望、荒谬和变态。现在许多年轻作家都如此，而普玄做的是好的，出色的。他小说中的人物，大多是反成长性的，都是一些坏孩子、不良少年、青春叛逆者，这样的人是人生的一个层面，它与主流教育是违背的，但这不是一个人的好与坏的问题，这与青春有关，与社会、家庭有关，如刀子一样可以杀人，但杀人与刀子无关，只能是与刀子的属性有关，不能说哪个好刀子哪个是坏刀子。而现实生活中，往往是这样的一批人最后成为正果，这也就是普玄小说被主流认可的原因。这又如同唐僧取经，仅有唐僧是取不下的，必须有猴、猪、马，还得有多类妖怪。取经要诚，取经也要有力。普玄是写了唐僧之外的属性，而最后却取回了经。

正因为如此，普玄小说与所描写的社会情境相适应的写作方法就不是线型的、白描式的、具有诗意的，而采取了色块重涂、色块与色块冲撞，并在语言上表现为坚硬与粗粝。

可以说，有的作家是消遣性作家，而有的作家是创造性的，甚至是灵魂性的作家。普玄是具有创造性和灵魂性的作家。当我们在他的小说里读出了一些怪味，甚或一些臭味，但当你看出他的小说原本是那样的通俗甚或俗气，而又在这些通俗、俗气里摆脱掉了恶气和痞痞，你就会感受到他的独创性。

但是，我还要说一点，即当我们在追问：中国的精神是什么，中国人的灵魂是什么、现阶段的中国人的精神追求与生活方式如何，又怎样指向未来?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，普玄的小说以古人山水观来看，已进入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层面，但还未达到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的层面。

我要提醒的，是不必过早固化而限制自己，如何在丰富中简约，如何在柔弱中坚硬，倒是普玄要加强的。

普玄给我寄过一个材料，那材料中提出将普玄的现象定位为一个“反成长小说”的名分。我不懂理论，但我觉得反成长只是表象的一部分，不足以概括其作品全部，且此名能否成立，我说不准。以我的认识，先不要命名，不要正名，那也没有更大意义，且易将人引导到另一个方向去，不利于普玄的发展。普玄还年轻，正当旺盛期，不如其自然生长。树生长，根在地下运行，枝叶在空中运行，地下运行有土、石、力量艰难，空气中其实是坚硬的，在上下的坚硬中它会以生命的力量长成自己的模样。其实，这是什么模样，品种就决定了，绝不会在树苗出了土，它是榆树而给它施肥浇水让它长成杨树，它是杨树的品种必然就长成杨树，外部的努力只能使它这个杨树长得更粗更大。

屋的咏叹，有作家梦的最初萌动，有乡村痴女的爱情，有对已逝慈母的祭文……而我的那本乡情书里也有，形式和情愫如同出自一人之手。我想这是我们同处一个特定的时代、生活、个性所赋予的结果吧。

时间在推移，人在变老，这一漫长的过程无疑是一笔财富。反思与回望是必然的。回望不是标榜，不是炫耀，是分享与激励。正如喻晓所说：“我的记录，是感恩，对母亲、对村庄，对养育过我的土地。我想通过我的记录，留住一个村庄的记忆。这是一次文化的寻根，精神的返乡。”我想，身处当今浮躁喧嚣的人们，面对生活的压力、金钱的诱惑，向往的迷惘，反省自己曾经的过往，风顺也罢，逆境也罢，贫穷也罢，富足也罢，读一读《翻阅美丽与忧伤》这本书，会有许多联想和启迪。

上回娘家的那条小道/却找不到娘了/一丘黄土 疯长的青草/剪断了家族的脐带/李家的墓地 就这样硬着心肠拒绝/自己的女儿//这一生 我只想做李家山庄的农妇/可我最终只能是被困在城市阳台的山菊/不能带走李家山庄/一小撮泥土”(《李家山庄》)。这不能让人黯然神伤。李林芳自己也曾说：“我的村庄已经丢失很久了。”“我想我的村庄是再也找不回来了。”“在我自己的概念里，一个丢失了自己村庄的人，失却了扎根的泥土，只是虚浮在尘世中。”正是因为没有了现实中自己的村庄，“那么，就让我在纸上找到她吧。这一生，或许我都不能去那里居住，但我在寻找，在心里一点一点靠近，抵达她。我要从这个广阔、嘈杂的世界里寻找她的影子，要从纷繁杂乱的词语的缝隙中寻找合适的材料，搭建房屋，规划田园，整理柴扉和院墙，渲染、勾勒雨水、山峦和溪流，我在纸上重置并建构这个叫艾润的村庄，用我的生命和与生俱来的脆弱和敏感，构建我的王国。”所以，李林芳诗中的艾润并不是向壁虚造，不是逃避，而是包含了一种抵抗、拒绝、坚持，这其中甚至有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决绝。李林芳的艾润书写初看似乎简单、清澈，但实际上内涵很丰富，宽阔而幽深，有颇多值得玩味、思考之处，其“简单”也是一种“复杂的简单”。

李林芳的艾润在高速运转的现代生活之外提供了一种宁静、美好的生活姿态，另外的一种种体系，它如清风拂面，沁人心脾，亦如挽歌一曲，令人喟叹、忧伤。希望李林芳诗中的艾润能够不断成长，呈现更多的复杂性与丰富性，带给我们更多的感动、思考与惊喜。

有创造性的作家

□贾平凹